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中国的历史思想

——宫崎市定论中国史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尤东进 马云超 童岭 杨洪俊 张紫毫 译

中国的历史思想

中国官制的发展

六朝时期江南的贵族

中国河川的历史考察

宋代的煤和铁

关于中国的铁

难道有两个宋江吗

中国火葬考

二角五爪龙

顷亩、里与丈尺

万宝槌考

元朝统治下蒙古官职所见蒙汉关系

马可波罗的幽灵

从洪武到永乐

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

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中国的历史思想

——宫崎市定论中国史

「目」宫崎市定著 张学锋 尤东进 马云超 童岭 杨洪俊 张紫毫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历史思想：宫崎市定论中国史 / (日) 宫崎市定著；张学锋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ISBN 978-7-5325-8815-2

I. ①中… II. ①宫… ②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357 号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中国的历史思想

——宫崎市定论中国史

[日] 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尤东进 马云超

童 岭 杨洪俊 张紫毫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12,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15-2

K·2477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国的历史思想·····一

- 一 绪言·····一
- 二 史料的问题·····四
- 三 理解的问题·····一〇
- 四 评价的问题·····一六
- 五 表达的问题·····二二
- 六 近期的历史思想·····二八

中国官制的发展·····三三

——从上古到唐代

- 一 从爵禄制到官品制·····三三
- 二 中央政府的变迁·····三七
- 三 地方政府的沿革·····四一
- 四 中央集权的加强·····四四

六朝时期江南的贵族·····四八

- 一 绪言——西晋的贵族·····四八
- 二 东晋的贵族·····五一
- 三 革命下的江南贵族·····五六
- 四 结语——江南贵族的消亡·····六二

中国河川的历史考察·····六四

- 一 河川与交通·····六四
- 二 黄河水系与古代文明·····六六
- 三 扬子江流域的开发·····七〇
- 四 运河的意义·····七二

宋代的煤和铁·····七六

- 一 绪言·····七六
- 二 煤炭的普遍使用·····七九
- 三 冶铁业的新局面·····八七
- 四 铁与北方民族·····九二
- 五 铁与中国历史·····九六

关于中国的铁	一〇七
--------	-----

一 绪言	一〇八
二 汉代的铁	一〇九
三 中世纪的铁	一一四
四 宋代以后的铁	一二一
五 结语	一二五

难道有两个宋江吗？	一三〇
-----------	-----

中国火葬考	一四七
-------	-----

一 中国人的丧葬观	一四七
二 中国火葬的起源	一五一
三 元代的火葬	一五六
四 明代的火葬	一五八
五 清代的火葬	一六一
六 儒家思想与佛教	一六三

关于二角五爪龙	一六九
---------	-----

一 宋朝天子对龙纹的独占	一六九
二 金元之制	一七二
三 明清时期的四爪蟒	一七七

顷亩、里与丈尺	一八三
---------	-----

一 顷、亩、步	一八三
二 作为面积的里——尤其是《诗经》中的「三十里」	一八六
三 城墙的长度	一九〇
四 乡村与坊郭	一九五

万宝槌考	二〇〇
------	-----

从元朝统治下的蒙古职官看蒙汉关系····· 二一〇

——再论元朝恢复科举的意义

- 一 蒙古官职····· 二一〇
- 二 达鲁花赤····· 二一二
- 三 蒙古必阁赤····· 二二三
- 四 恢复科举的意义····· 二二三
- 五 结语····· 二四〇

马可·波罗的幽灵····· 二四四

——CATALIO 国的消亡

从洪武到永乐····· 二五六

——明朝初期政权的性质

- 一 元明革命的印象与现实····· 二五六
- 二 元、明两朝连续性····· 二六〇
- 三 太祖与元朝的诀别····· 二七一
- 四 永乐朝政治上的回归····· 二七四
- 五 结论与余论····· 二七九

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

地图····· 二八四

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 二九六

- 绪言：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吗····· 二九六
- 一 太平天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 三〇〇
- 二 太平天国是鸦片战争的继续····· 三〇六
- 三 太平天国独特的性质····· 三一二
- 四 太平天国性质的转变····· 三一五
- 五 太平天国与农民····· 三二三
- 六 太平天国与其敌对势力····· 三二九
- 结语····· 三三三

中国的历史思想

一 绪 言

在各种各样的学问中,历史学尤其是一门非常尊重具体和客观的学问。当然,不尊重客观的学问是没有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历史学非常尊重原始史实这一点。如果是哲学,历史史实若没有被抽象化,似乎就很难进入到哲学体系中去。这样说,也许会遭到众人的谴责,但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对历史学而言,原始史实也不能将其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独考察,必须将其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因此,在历史学中,用抽象的语言来概括和总结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当然,把握原始史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它却是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任务。为了把握原始史实,必须以其他更多原始史实为参

照。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历史学都是离不开原始史实的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之所以说历史学是一门尤其尊重客观性的学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实际上与“历史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历史学是什么”,实际上可以从“怎样研究历史”这一问题中获得答案。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出“历史是什么”。

这正如在法国进入一家餐厅,服务生会省去“点葡萄酒吗”这一询问,而是直接从“来点白的还是红的”这一具体的点单开始。不管是红的、白的,还是波尔多、勃艮第,只要这么一回答,自然就回答了省去的第一个问题。

历史是什么?更具体地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史料”的问题。历史是由史料构成的,没有史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可知的历史,与完全没有是一样的。认识历史与认识史料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历史学就是寻找史料的学问。这样一种如此反复的循环论,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好懂的,而且这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使用非常抽象的语言来替换表述,也无法让我们对历史的内容产生进一步的理解。

认识真实的史实,必须要有真实的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让史料来讲述史实的学问,是完全依赖史料的学问。因此,“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还可以还原成“使用什么样的史料”或“如何使用史料”。固然,这里所说的“史料”,并不是

指什么特别的存在,人骨、书籍、工艺品、自然物等都可以成为史料。然而,史料的形成、传播,其本身就是一种史实。首先发现史料,然后看它能否讲述自己想要知道的史实,这就是历史学。说到底,历史学就是一门让历史事实讲述历史事实的学问。

从所有的事物中发现史料,并且仔细揣摩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讲述历史事实,这在历史学中又被称作史料学。现在的史料基本上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尽管前人的成果功不可没,但到了让史料讲述史实这个阶段,责任就转移到了作为听众的历史学家一侧。杰出的历史学家可以娴熟地、丝毫不差地听取史料所讲述的东西。史料与用留声机播放唱片不一样,不同的听众可以听出完全不同的声音。更何况,很少发出声音的史料,也许会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下诉说着无数的史实,因此听众必须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分别听取。其实,这就是理解与评价的问题。这两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理解的判断是不存在的,而没有判断的理解,也不能说是真正的理解。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学问之外,还必须将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向世人讲述,这样就产生了表述的问题。

现在,我要做的是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讲述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思想。为便于陈述,我尝试站在自己的历史认识上,将这个问题分为“史料的问题”、“理解的问题”、“评价的问题”、“表述的问题”等四部分来展开概述,将这四部分的内容综合起来,就是中国的历史思想。

二 史料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记述是从王者的记录开始的,现在这些记录成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在任何一个世界,出现记录的前提都是权力者的出现,王者身边有专门记录其言行的书记官,在中国单用一个“史”字来称呼他。因后世将其记录的东西也称为“史”,所以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在“史”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官”字,于是出现了“史官”这个名称。

殷墟卜辞以及金石文字等,因其时代过于古老先暂且不论,被后世尊为最古老的权威性史料《尚书》中的各篇,都被认为是帝王身边的史官所做的记录。中国的文字,正是由这些世袭的史官来执掌的。作为帝王记录的《尚书》之所以会流传百世,依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它们被作为记录的范文以及学习文字的模本而得以保存的。其内容不仅涉及帝王个人,还涉及与国家大事相关的祭祀与军令,后人只要稍稍替换一些文字,就可以适用其他新的场合。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性质,《尚书》各篇仅限于个别事实的记录,还没有出现表现连贯史实的自觉。至于连贯的历史事实,对当时人而言则是自明之理,全都托付给了每个人的记忆,并没有意识到必须将其保留在记录里。

记载连贯史实的史料是从鲁国的国史《春秋》开始的。《春

秋》是鲁国史官将当时发生的事件连续记录而成的,内容是鲁隐公元年(前 722)至哀公十四年(前 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是,它的原文极其简单,以至被后世诋毁为“断烂朝报”。然而,对当时人来说,只要有个框架,凭记忆就能回忆起较为详细的史实。记忆的这一部分,就成为后世的《左氏春秋》,更进一步发展成保存至今的《春秋左氏传》。包括《左氏传》在内的《春秋》,是鲁国朝廷的记录,因而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连贯的历史。但它仅仅停留在记录君臣关系上,视野非常狭隘,完全没有将中国的整体动向以及市民的生活等内容作为记载对象。

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渊源、发展以及广大市民的生活展开叙述,并将之编撰成综合性历史的工作,始于汉代的司马迁。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今天看来,不仅是非常优秀的史料,同时也是一部完全具备了编撰体例的历史著作。司马迁本人是汉王朝的史官,所以他可以充分利用朝廷所藏的前代记录,将其作为史料来使用。《史记》的《本纪》与《世家》,即记载帝王与诸侯国隆替的部分,其主要内容应该是基于朝廷的官方记录以及学者家传的典籍构成的。然而,司马迁并不满足于朝廷所藏的历史记录,他本人还亲自广泛收集史料,收集史料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旅行。司马迁是一位大旅行家,依其自己所言,其旅行的范围,北抵今北京附近的涿鹿,西至甘肃的崆峒,南达江淮流域,东至大海,当时文明世界所能到达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个范围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帝王之尊巡视天下的区域几乎一致。司马迁以区区一介

官吏之身,不辞艰辛,游历了帝王巡幸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国土,所到之处,采集当地的口碑及传说。他将黄帝视为中国历史的起源,这或许是他旅行至涿鹿,在当地采集传说的结果。

司马迁的旅行,对其将记录的视野扩大到一般市民阶层有着很大的帮助。这里所说的“市民”,是指相当于中国所说的士阶层。何谓“士”,简言之就是指有权利和义务拿起武器保护国家的壮丁。上古时期,这样的“士”只限于贵族子弟,进入战国以后,“士”的字义也发生了改变,意指各诸侯国都城的军士集团,秦汉时期扩展到了全国的广大农民。司马迁的《史记》,最早以这样的市民为记述对象,用出色的文字写下了《列传》。毫无疑问,这时的司马迁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的历史事实,社会不全是由君臣关系构成的,时而迸发出来的市民生活同样也是社会的支撑力量。散见于《列传》中那些趣味横生的故事,应该都是依据他个人采访到的独特的史料写成的。《史记》可以说是一部用脚写成的历史,这也正是《史记》作为历史著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将历史还原成君主与官僚的君臣关系,以及支撑这种关系的市民就了事。君主也好、官僚也好、市民也好,他们都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制约当中,因而有制度、有经济、有道德、有文化。司马迁将这些内容总结成了《礼书》、《乐书》等“八书”。当然,今天来看这些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但其意图却非常明了。

我所说的中国市民生活，在汉代达到了顶峰，以后便走上了下坡路，六朝时期出现的是被称为“士族”的特权贵族阶级。中国的历史著作也与之相应，记录贵族的盛衰成了史料的主要内容。在所谓的正史中，从《晋书》到《唐书》，《列传》的篇幅几乎全被贵族家庭的系谱所占据。相当于《史记》“八书”的部分，从《汉书》开始则被改称为“志”，而《汉书》以下诸书的“志”大多缺失。从《晋书》到《唐书》，任何一部都成于朝廷史官之手，他们自身就是贵族，他们使用的史料，一概都是贵族家庭的系谱，以外的史料并没有多少涉猎。

宋以后，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前代的贵族基本上全部没落，社会转变成为科举官僚的世界。这种社会转变反映在史料中就是，《宋史》以后历代官修正史中的“列传”部分，几乎成为高级官僚的履历书。而“志”的部分，也只不过是朝廷按需编定的法规类文献的汇编。总之，历史著作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但由于其中很少掺入史官的主观判断，只是史料的编抄，因此在准确性方面有可采之处。从中也不难看出，历史著作沦落成了一种史料汇编。这也是因为史官的性质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在司马迁时代，自己虽然是史官，但与官僚相比，市民的自觉似乎更强。一旦进入贵族时代，史官作为贵族之一员的自觉更强。接着进入独裁君主的时代，史官的官僚意识非常突出。可以说，历代史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其实是历代史官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史料处理的结果。

从现在的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正史作为历史著作来读大多数都非常无聊,但是,单纯地作为史料来看,却是非常优秀的。中国以外的任何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两千余年间明明白白地写清帝王的在位年月、权贵官僚的事迹的?作为史料,对中国史研究极为有用的还不单单是正史,通读了记载各代制度的“九通”这样的著作,就可以了解到官制、土地制度、经济状态的梗概。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还有像“九通”中元代编撰的《文献通考》这样便利的书籍吗?然而,有点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并不是作为创作而编撰的,其目的只不过是摘抄史料传至后世而已,但必须承认,它们在选择“哪些是必要的史料”时特别用心。

与此同时,也出现“历史能这么写吗”的反省。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幾撰写了空前的名著《史通》,论述了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历史学必须回归到汉代以前,掌握《尚书》、《春秋》、《左传》以及与《左传》有内外篇关系的《国语》、《史记》、《汉书》这些著作所具备的特征,并且必须以它们为范本。刘知幾生活的唐代,贵族制已经衰微,处于贵族制社会的末期,在贵族制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个人的自觉,《史通》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宝贵的批判精神的体现。

然而,好不容易从贵族制的崩溃中产生的个人自觉,宋代以后受到了更深的新的官僚主义的束缚,历史学再次跌入低谷。在官僚主义开始动摇的清朝,我们再次迎来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

批评学家,他就是撰写《文史通义》的章学诚。

章学诚的史论涉及多个方面,这里姑且不论其他,只谈谈史料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应该包罗社会上的所有事象,主张当时被认为与历史学毫无关系的儒家经典《易经》、《诗经》等都可以成为史料。《易经》是占卜之书,但同时也是先王的教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教训,其原因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其中充满了对人生有指导意义的内容。《诗经》中收录的大多数诗歌都是民间自然而然产生的歌谣,是古代王者为了了解民间舆论作为政治参考而派人采集的,因此它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史料。此外的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自不待言,《礼》、《乐》等都是当时的制度、文化,当然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是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学说。也就是说,儒家经典均为历史著作,经史同一。

章学诚感叹后世的历史著作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记录,以致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在他看来古代并不是这样,朝廷的史官非常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哪怕再低俗,只要其对政治有益,那就是被采访的对象,进而将之作为政治的参考,所谓的经典,也正是这些东西的汇集,这些内容都能够成为如实撰写历史的材料。因此,今后如果想要撰写历史著作的话,必须仿效古代圣王的做法,留心收集社会各方面的材料。根本不入高级官僚法眼的那些地方小吏撰写的事务性书籍,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以上就是章学诚史论的大概。

这些言论在十八世纪的当时是非常进步的,预见了后世民俗学、古文书学的出现。章学诚虽然天资优秀,但在当时的官场上却屡不得意,只能应众多显贵达官的聘请而做宾客,并临时担任地方志的编修以资糊口。由于编撰地方志的需要,才促使他去思考“历史应该如何写”这样的问题。然而,辞世前他并没有完成一部实践自己主张的史书。

最早认识到章学诚史论的卓越,并不遗余力进行推奖的,正是已故内藤湖南博士。稍后,近年去世的胡适博士民国时也对其极力褒奖,那完全是受到了内藤博士启发的结果。再稍后一些,顾颉刚以及日本学者将章学诚史学中极具启示的民俗学的方法,实际运用到了历史学中,从而掀开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篇章。

三 理解的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历史”这个问题,历史学研究的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看法是不同的。对一般人而言,历史一开始就有着不言自明的东西和被附会上去的东西,主要问题是如何去理解它们,而对专家而言并不是这样。专家必须亲自从史料中发掘史实,并进一步剔除其中伪造的成分。

中国上古时期以禅让的形式来实现政权的更替,这在儒家的经典中频频被提及,所以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例如帝

尧尽管有儿子丹朱，但他还是从民间发现了才德兼备的舜，并将帝位禅让给了他。但是，针对这样的说法，最先发难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刘知幾。刘知幾读到了《汲冢琐语》这本书中记载的“舜放尧于平阳”一段，《水经注》里记有“囚尧城”的地名，《山海经》里也有“帝丹朱”的说法，因此，在刘知幾看来，所谓禅让是一个十足的谎言，事实上应该是尧的大臣舜掌握了实权，首先放逐了尧，并将其软禁在囚尧城，暂时立尧之子丹朱为帝，但不久便篡位了丹朱之位，自立为天子，这与后世的篡权夺位并没有什么两样。刘知幾之后一千余年的民国时期，怀疑上古历史真实性的风气一时盛行，由此产生了疑古学派。

按儒家所说，殷周革命并不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而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的。《尚书》的《武成》篇记载了当时激烈的战斗场面，称曰“血流漂杵”。《孟子·尽心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子的弟子向孟子提问，为什么非要进行如此惨烈的一场战争？对此，孟子回答道：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弟子“唉”了一声便退下了。^①

① 《孟子》原文中未见。